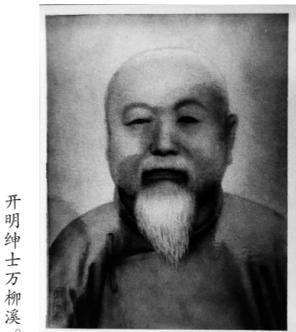


台儿庄沦陷后，中国共产党、八路军领导当地人民群众，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抗日斗争。随着形势发展的需要，1940年，八路军一一五师和中共鲁南区党委派人前往台儿庄，联络当地开明士绅万柳溪，在其中开设了地下贸易情报站。万柳溪赤诚爱国，其家人也都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活动，为抗日根据地购买、运送军需物资等方面均作出积极贡献。



开明士绅万柳溪。

活跃在台儿庄的地下贸易情报站

1 万家大院：地下贸易情报站

万柳溪出生于经商世家，思想进步，早年曾加入同盟会。全面抗战爆发后，万柳溪在抱犊崮山区万春圃（后任八路军鲁南军区副司令）家躲避战乱，结识了中共鲁鲁豫皖特委的领导人，并对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主张深表赞同。

1940年秋冬之际，中共鲁南区委派第七区区长万国华（万春圃之子）和八路军一一五师情报处处长邝任农的秘书王正言来到台儿庄开展统战工作，受到万柳溪的热情接待。他们转达万春圃的口信，希望万柳溪以实际行动帮助共产党、八路军，万柳溪欣然同意。1941年底，王均陶受万国华委托来到台儿庄，在万柳溪经营的万顺昌商号设立地下贸易站。在万柳溪的安排下，王均陶的公开身份为万顺昌商号管事。1942年春，鲁南区委组织部设立城市工作科，重点抓敌占区的城市和交通线的地下工作，又派张德启来到万家，秘密开展对敌情报工作，地下贸易站由此被称为地下贸易情报站。

万柳溪利用自己在台儿庄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对贸易情报站的工作给予积极配合，并出面协调该站人员和当地社会各个阶层人士的关系。

2 保护党的干部及家属

1941年至1942年，是鲁南人民抗战最艰难、困苦时期，日伪军加紧对根据地“蚕食”“扫荡”，与此同时，国民党顽固派还不断制造摩擦。

1941年10月26日夜，国民党顽固派部队发动突然袭击，包围了鲁南区委驻地银厂村。为掩护干部群众突围，中共鲁南区委副书记兼军区政委赵铸率鲁南军区警卫连英勇阻击敌人，不幸被捕，惨遭杀害。

1941年秋冬之际，党组织将赵铸的爱人李炎及其幼子赵继烈秘密送到台儿庄万家隐蔽保护。万柳溪以李炎为其妻妹的名义办理了“良民证”。

万柳溪夫妇把赵继烈当成自家孩子一样对待。当时，李炎因赵铸牺牲而悲伤过度，身体虚弱，赵继烈当时不满3个月，嗷嗷待哺。万夫人就为他买来奶粉，亲自给赵继烈喂奶、洗尿布，每天都过来陪李炎说话，以姊妹相称。在李炎身体不适时，万夫人怕孩子小受到惊吓，晚上就陪床睡，帮李炎照顾孩子。李炎母子在万家生活了约1年时间后，被组织上秘密转移。此后，沂河支队司令员宋鲁泉的母亲

（万春圃的姐姐）及其子被送来在万家住有一年半；鲁南总动员委员会宣传部长、鲁南区参议会参议长彭良三的妻子韩毓影（鲁南抗日子弟小学教员）也来到万家，住了1个多月；万春圃的夫人刘惠和7岁的5儿及不满周岁的六儿也被送到万家，住了1年之久；临邛费峰四县边联县参议会参议长盛清沂的儿媳王宝君带着孩子来到万家。因她有文化，被万柳溪介绍到台儿庄小学教书……

党的干部及家属住下后，万家不仅供应食宿，临走时还要负担盘缠路费，这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为此万家变卖了不家地。万柳溪的五女儿万万春回忆说：“父亲为了解决避难革命干部及家属生活问题，把自家的地卖了不少，宁让他自己的孩子吃得‘霉一点’，也要给‘客人’做得好一点，炒个菜‘客人’多一点，我们少一点，也经常会把家里喂的猪和羊宰杀给他们改善生活。”有时候家里来的“客人”多，她们姐妹就睡门板，床都让给“客人”。这些“客人”没事的时候就给万家人讲共产党的事，还经常唱着小调（后来才知道那是革命歌曲），万家人也跟着学。

3 抗日根据地的秘密物流中转站

为了掩护抗日根据地与敌占区之间的商业秘密贸易往来，万柳溪在台儿庄城北六里的栗庄村特别设了一个榨油坊。榨油坊的原料多是铁道大队从敌人火车上缴获来的大豆，从根据地秘密运来，在栗庄榨油坊制成豆油批发销售，用以换取经费，或换取根据地需要的物资。不久，榨油坊又发展成根据地与游击区、敌占区输送枪支等军需物资的中转站。

从1941年3月至1942年期间，日伪为了“困死”共产党、八路军在鲁南的抗日力量，大搞“囚笼政策”，对游击区和抗日根据地严加封锁，

将物资送往根据地变得日益困难。为了给抗日根据地提供更多的紧缺物资，万柳溪出面秘密联络台儿庄多名具有进步思想的商号、货栈老板共同行动，为根据地筹集了更多的物资。

为打破敌人的封锁，地下贸易情报站的同志和万柳溪研究决定：由万柳溪出面，以万家能为沿途伪军提供“三白”（粮食、食盐、棉花）物资为交换条件，从敌人手中获得了物资运输“通行证”以及押运人员的“良民证”。为了保证物资的安全，地下贸易情报站一般会挑选可靠人员，以独轮小推车或肩挑的方式运输。

4 积极参与对敌货币斗争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大搞所谓“以战养战”。为进一步掠夺战略物资，压榨敌占区民众，日军特务机关大量伪造法币并投放市场，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物资短缺，有法币流通的根据地也受到影响。

为了打击敌人的掠夺阴谋，稳定根据地金融，中共鲁南区委在山东分局的统一部署下，展开了对敌货币斗争。北海银行鲁南支行于1942年在根据地周边各县设立办事处，统一领导各县的排法币、禁用伪钞和发行北海币的工作，并逐步建立独立自主的金融市场。台儿庄地下贸易情报站在鲁南区委的直接领导下，按照鲁南贸易工商局的部署，依靠万顺昌商号的关系，与台儿庄的爱国商号建立起越来越牢固的贸易往来。在地下贸易

情报站和万家的积极推进下，用以采购根据地土特产；土特产运回台儿庄后，商号高价出售给日伪，并从日伪手中购置机械、医药（甚至枪支）等物品送回根据地销售。贸易中，各商号出于对地下贸易情报站的信任，均承认和使用北海币，并按照根据地银行开出的比率兑换。

不久，鲁南区委为进一步开展物资贸易和货币斗争，又在台儿庄城北的刘郭村开设“鲁南商店”，因该商店主要经营项目为食盐，又被称为“盐槽子”。“盐槽子”建立后，和台儿庄地下贸易情报站迅速取得了联系，双方密切合作，进一步保障了对根据地物流的畅通，北海币也在台儿庄进一步流行起来。

（据人民政协网）

读史忆人 典故

顾祖禹与《读史方輿纪要》

顾祖禹（1631—1692年），字瑞五，号景范，江苏无锡人，后徙常熟，世称宛溪先生。其所著《读史方輿纪要》（以下简称《纪要》）问世后，受到广泛重视，时人将之与梅文鼎《历算全书》、李清《南北史合抄》合称三大奇书。

顾祖禹家学渊源深厚，父亲顾柔谦精通历史地理，是当时有名的方輿（地理）学家。从小跟父亲耳濡目染，顾祖禹受到了良好的学术训练。顾柔谦有强烈的爱国情怀，认为地理知识的匮乏与错误是明朝当时军事失败的重要原因，所以立志写一本实用的军事地理著作，但因国家灭亡悲愤过度，以致身患重病，临终嘱咐顾祖禹完成遗愿。

顺治十六年（1659年），顾祖禹开始撰写《纪要》。为写好《纪要》，顾祖禹广泛收集材料，力求竭泽而渔，不遗漏每一个可以获得的材料。他治学严谨，对收集到的材料，都进行严格辨析与考证，确定无误后才采用。

康熙十八年（1679年），顾祖禹终于完成《纪要》撰写，此时他已年近50，距离开始写作已过去20年。此后岁月中，他一直从事《纪要》修订工作，直到去世前仍在修改，用30余年的光阴写出了一部地理学巨著。

《纪要》重点阐述历代行政区划沿革、山川险要、攻防利害，兼论历代战事的得失成败，是一部历史地理和军事地理融为一体的专著。全书将史事与地理相互印证，“以古今之方輿，衷之于史，即以古今之史，质之于方輿。”通过

分析地理形势，进而更深入理解历史重大事件；通过考证历史重大事件，以便全面认知地理形势，因此顾祖禹将书名命名为《读史方輿纪要》。

《纪要》全书130卷，合计280余万字。鲜明的军事色彩是《纪要》的重要特点。全书着眼于国防需要，详细论述地理形势、山川险要、军事要塞，对名胜古迹、旅游景点则简略叙述。每一省卷首撰有总叙，概论地理形势，同时引用大量战争史实，以展现成败之关键。每府、州、县同样是这种体例，但论述内容更为详细。

区划沿革的详细考证是《纪要》另一个鲜明特点。中国历代正史的地理志往往局限于一朝一代的区划变革，而《纪要》则对4000余年区划变迁进行了详细论述，尤其对县域的分合、地名的变更、江河湖泊的变迁等进行了重点考证。

辩证思维是《纪要》的又一闪光点。顾祖禹虽然重视地理，但并不是地理决定论者。他指出地理战略优势的发挥，也需要人的努力，不能单凭地利，所以他强调“封域不可恃为强，城郭不可恃为固，山溪不可恃为险”。同时，自然地理的高下险易虽然是固定的，但是战争一旦发动，敌我形势却是不确定的，“州域之建置有定，而形势之变动无方”。人们需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审时度势，因势利导，才能发挥地理的优势。

（据《学习时报》）

拾遗

古人用什么漱口

在公元前3000年，我国就已有保护牙齿清洁口腔的记载。早在春秋时期，《礼记》就有“鸡初鸣，盥漱”的记载。我国最早使用的漱口剂有酒、醋、盐水、茶及温水等。酒、醋、盐水等有解毒杀菌的作用。茶中含有氟和维生素，可以防蛀，保持口腔清洁。五代时期已经出现了复方配制的洁牙剂，以后又逐渐发展到采用香药去秽，在牙齿清洁剂中加入清热解毒的中药如金银花、野

菊花、蒲公英、藿香、佩兰等，不仅能保持口腔清洁，还有治疗口腔疾病的作用。

据史料记载，我国公元前就开始用“牙刷”来清洁牙齿，当时使用的工具十分简单，如杨柳枝。东汉安世高译《佛说温室洗浴众僧经》中讲到洗浴时所需的7种用具，其中有“六者杨枝”之句，就是将杨枝的一端或两端打扁成刷状，形如扫帚，以蘸药或香料刷牙。（据《天津日报》）

宿白与“白沙宋墓”

1951年，在修建白沙水库的过程中，考古人员在工地发掘出数百座墓葬，其中有3座仿木砖筑结构的宋代家族墓，许多精美的壁画保存完好。1951年12月上旬，考古发掘队对最早发现的古墓进行发掘、清理，这就是后来被业界所称的一号宋墓或赵大翁墓。

1952年1月10日，一号宋墓的发掘工作基本完成。由于这座宋墓墓室上有内容为“元符二年赵大翁……”的题记，以及该墓地券中写有“大宋元符二年九月十日赵某……”的字样。考古人员又在二号宋墓的西北方向20米处、东北方向16米处，各发现了一座和一号宋墓形制类似的墓葬，分别命名为二号宋墓和三号宋墓。

三座墓葬中，年代较早的一座修建于北宋元符二年（1099年），据墓中文字，墓主叫赵大翁，身份应是当地的地主或商人。据了解，仿木建筑的雕砖壁画墓流行于北宋末年中原和北方地区，白沙宋墓是这类墓葬中保存较好、结构最复杂、内容

最丰富的一组。

1954年，宿白撰写的考古报告基本完成，同年在北京举办“全国基建中出土文物展览会”上展出了白沙宋墓的壁画摹本。1957年《白沙宋墓》正式出版，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出版的考古报告之一。在我国历史考古学草创时期，《白沙宋墓》的编写无先例可循。

多年过去，《白沙宋墓》一版再版，其开创的编写体例和对墓葬结构、墓室壁画的精深考证，仍深刻地影响着同一历史时期考古学的研究。2001年3月，白沙宋墓被评选为“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2021年，被评为“百年百大考古发现”。作为北宋晚期仿木建筑雕砖壁画墓的考古发掘，白沙宋墓不论在墓葬的规模形制上，还是仿木建筑细部和彩画制作，以及雕砖壁画的题材和内容方面，都是空前的发现，也为世人打开了一扇窥探北宋历史文明和灿烂文化的窗口。

（据《人民政协报》）

支援首都义不容辞

1956年初春的一天，外交部收到印度驻华大使小尼赫鲁的一封信。在信中，小尼赫鲁表达了他的不满，说他在北京做了一套西服，连改2次仍不合身。这已经不是外交部第一次接到类似的“抗议”了，很多西方外交官都对北京的服务行业很有意见。为此，外交部派专人特意找到有“西服圣手”之称的红帮裁缝余元芳为小尼赫鲁更衣。余师傅只花了2天时间就把西服改好了，小尼赫鲁穿上后非常满意。后来，小尼赫鲁还特地给她写了一封表扬信。

偌大的北京城竟做不好一套西服，这引起了中央的关注。1956年，周恩来提出“繁荣首都服务行业”的号召。接到周总理的指示后，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万里亲自到上海，动员上海的餐饮、服装、洗染、照相、美发等服务行业的著名企业，来北京安家落户。尽管这些著名企业都是上海一流的品牌，但上海最终还是忍痛割爱，因为那年代全国支援首都北京，不仅仅是光荣，更是义不容辞的责任；而北京方面也开出相当优厚的条件，不但负担上海来京人员的路费、提供来京后的住宿，而且保证来京人员原有工资不变，并承诺在一年之内把他们的家属全部调入北京。（据《天津日报》）

被毛泽东称为“坚决革命的同志”

——赵博生同志纪念碑碑文敬读

壹 宁都起义擎赤旗

赵博生，1897年出生于河北沧县东慈庄（今属黄骅市）一个农民家庭。1917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6期，先后入皖系、直系、奉系军队中任职。1924年冬转入冯玉祥的西北军，任旅参谋长、特种兵旅旅长、军参谋长，参加过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其间受共产党人刘伯坚等的影响，倾向革命。他曾创作《革命精神歌》在部队教唱：“先锋！先锋！热血沸腾，先烈为平等牺牲，作人类解放救星。侧耳远听，宇宙充满饥饿声，警醒先锋，个人自由全牺牲。我死国生，我死犹荣，身虽死精神长生，成功成仁，实现大同。”

1931年春，由赵博生担任参谋长的国民党第26路军被派往江西“围剿”红军，但早在这之前，他就曾派心腹张杰去往上海联系共产党，可是直到部队抵达江西，仍未联系上。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第26路军官兵爱国热情高涨，集体要求：调第26路军回北方，我们要去打日本！可蒋介石以“攘外必先安内”予以驳回。将士报国无门，还要同胞自相残杀，赵博生不愿无视国耻，不愿干手足相残的事。就在这时，潜伏在第26路军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察觉到了赵博生的政治动向后给赵博生写信，邀请他一同革命，赵博生没想到自己苦苦寻找的组织就在身边。他表示：我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叫我干什么，就干什么，即使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同年10月，经中共中央批准，赵博生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中共

国共产党党员。

1931年12月14日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天，赵博生和董振堂、季振同等率领第26路军17000余人在宁都举行起义。当天晚上，赵博生在宁都城东门耶稣教士住过的二层楼房里“设宴”，将留在宁都的那些团长、旅长们都邀请赴宴，将少数反对官兵禁烟，缴下他们的枪支，以他们的名义，调其部队在指定时间、地点集合待命，并亲自在宁都城上写下“解放”二字。起义胜利后，17000余名将士全部加入红军，并改编为红一方面军第五军团，赵博生任军团参谋长兼第十四军军长。对于宁都起义，毛泽东曾这样高度评价：以宁都起义的精神用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是战无不胜的。



赵博生同志纪念碑碑文。

贰 满腔热血染红星

部队经过整编训练，战斗力大大增强，迅速壮大了红军的力量，使中央苏区主力红军从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的3万余人骤增至近5万人。同时，起义部队把大量精良的武器装备带到苏区，改善了红军的武器装备，大大提高了红军的战斗力。

红五军团成立不久，在赵博生的指挥下，参加了赣州战役、漳州战役和南雄水口、建宁等战役战斗，屡建奇功。为表彰赵博生和红五军团的战绩，在宁都起义和红五军团成立一周年时，中革军委通令嘉奖赵博生，并授予他“红

旗勋章”。可就在1933年1月8日，第四次反“围剿”战斗中，赵博生不幸在赣中弹牺牲，为苏维埃政权献出了生命，年仅36岁。

为纪念赵博生同志，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将宁都县改为博生县，1933年8月在瑞金叶坪红军广场上建造博生堡，临时中央政府特意制作了这块生平碑刻，镶嵌在博生堡的内墙。毛泽东称赵博生是“坚决革命的同志”。叶剑英于1962年八一建军节纪念日前作诗怀念先烈赵博生，诗云：“宁都霹雳响天晴，赤帜高擎赵博生。虎穴坚持神圣业，几人鲜血染红星。”（据《学习时报》）

碑文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于1933年8月拟写，讲述了赵博生矢志革命寻求光明，于西北军期间秘密入党并发起宁都起义，在第四次反“围剿”中率部奋战时壮烈牺牲的英雄事迹，读来深受感动，令人肃然起敬。